

# 前言：重返交界帶

2017年初，我開始動身前往桃園、新竹一帶沿山閩客傳統聚落進行實地調查和耆老口述的訪問，至今過了6年光景。除了意外重拾了原先「只會聽，卻無法說」的客語，認識地方上不少重要的泰雅、客家、閩南（本書中大多是福佬客）耆老之外，也開啟一處我從未細緻理解過的地方。而這一切都來要從一段家族長輩間無法述說，或避談不講的過往——「無頭祖先」講起。

## 族譜——回到鬼鄉

文滔公，全家老幼受生番所滅。

文舉公，不幸被生番所殺未娶而亡。

阿田公，日據時當隘勇征番後未調醫不治。

阿泉公，同治庚午年生，阿泉受生蕃所殺後……。



圖說：《梁氏族譜》裡面，對阿泉公遭殺害身亡一事的記述。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在家中清理倉庫時，無意間找到一本舊族譜，頁紙泛黃散落、裝線鬆脫且充滿霉味，大半部被蠹蟲啃食出曲折的凹痕，紅色的書封

滿布灰塵、印字褪色，紙頁間夾雜數不清的蟑螂屎。順手翻開，才想起小時候曾看過叔公新修的族譜，也曾經在上面翻找家族長輩的名字，印象中的《梁氏族譜》是精裝厚殼、乾淨潔白、彩色印刷且新細明體的電腦字型，紙張觸感厚實滑順、字體清晰的書本，被阿公收在神明聽的樟木櫃裡。

午夜時分，潮濕紙質發出的黴味更顯濃厚，眼前這本殘舊的族譜，如同不曾存在之物，家中也沒多少人知道它的來歷。我帶上麻布手套，小心翼翼地閱覽那細薄、脆弱紙張上的文字，一頁一頁的攤開又放下，毫無翻閱一本書的感覺。每張紙散落為單獨的狀態，裂解成尚未裱裝時的樣貌。內容從黃帝、春秋戰國、一路寫到宋、元、明、清，紀載著歷代梁氏遠祖的祖居地、官位和宗族訓誡。



圖說：1940年代梁氏家族的掃墓。

接著就看到「來臺祖」的部分，族譜上開始出現我熟知的登陸地點、居住地、人名、生卒年和墓葬地，以及個人事跡。從第十五世的來臺祖，到十六世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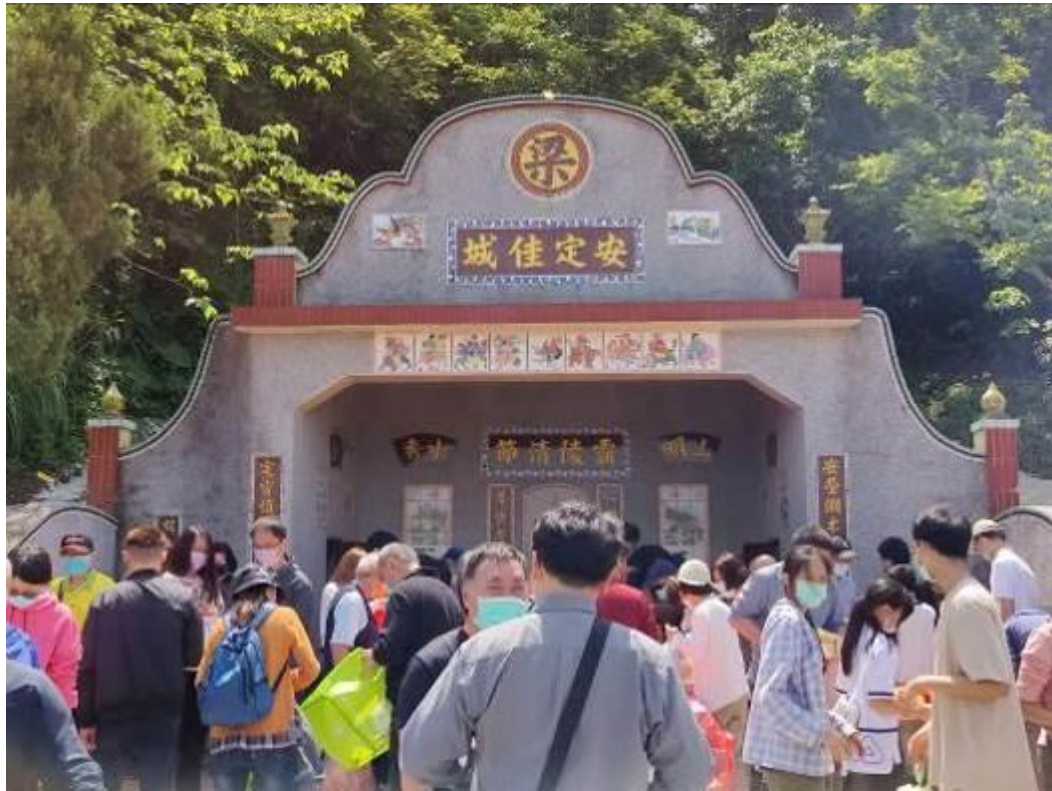
十七世祖、十八世祖……一段文詞將目光吸引住：「阿泉受生番所殺後，羅氏媽招徐光連公，生子榮昌，生下長男承梁姓，祀為徐梁二姓」。按照輩分，死者是我曾祖父的叔公，約莫死於 1821 年至 1850 年間（清代道光年間）。

那名「生番」是誰？為甚麼家中有人會被殺？那位梁阿泉又在那裡被殺？何時被殺？一連串的疑問在腦中閃過。但無論在這短短三十二個字之間如何來回推敲，仍看不出個所以然。那一夜，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徹夜未眠，決定早上去編修新版《梁氏族譜》的叔公那，借一本對照著看。逐句逐頁的翻閱檢視，總算找到「梁阿泉」的名字，卻赫然發現事跡欄內的那三十二個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清新空白的方格。為甚麼一個字也沒有？為甚麼叔公當時在修編的時候，將這三十二個文字刪除了？因為是一件不需要記得的事情嗎？還是有甚麼必須讓後輩忘記的理由？



圖說：1940 年代位於新竹關西下南片的梁氏祖墳。

我的家族支系，日治時期就從新竹縣關西鎮境內的丘陵地，遷往桃園中壢過嶺一帶居住，舉家離開待了 200 餘年、繁衍六七代人的耕居地。曾聽叔父說，老家是在關西鎮一處名為「下南片」的鳳山溪谷地，老家的位置是在一條產業道路的盡頭，再徒步進去 30 分鐘的山谷竹林深處，一處土名為「十四股窩」的谷地。我拿起地圖的比例尺，測量從關西、尖石山區到關西老家所在的山谷位置之間的座標距離，大約 4 到 6 公里之間。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到，這片飛鳳丘陵就是原住民的居地。



圖說：2010 年代梁氏家族的清明掃墓。

族譜中，加上命喪於新竹北埔與橫山地區的親族，家族有將近十個人橫死於這一帶的淺山。從清朝時期就入墾關西地區的先輩，在日治時期從這裡逃離出來，遷徙、定居在他處，此地僅留下一座祖墳，每年清明節時才會回到關西山上的祖塔祭祖。對出生於外地的我而言，此地是一處與死亡接近的「鬼

鄉」，是叔公、阿公、堂叔的安葬地，也是放金斗甕和骸骨的地方，父親在去逝之後，骨灰也回歸此地安放。被「生番」所殺的先人骨骸，經負責祭祀活動的家族長輩證實，並無放在祖塔當中，遺骨至今下落不明。

自此之後，一頁頁泛黃的殘紙，有股拉引我回到那裡的力量。從新竹關西的老家，向北往桃園的大溪、龍潭，向南到新竹橫山、竹東、北埔，我開始到鄰近的淺山村落詢問老者們故事，嘗試拼湊家族過去遺漏的歷史。隨著聽到的事情與接觸到人逐漸增多，體悟也逐漸加深。我慢慢發覺，客家耆老隨口就能提起的事情，部落的耆老也可以，雖然講述的角度各自不同，但似乎存在某些共有的記憶。

客家耆老將自己當作遭受殺害者的後代，彷彿一切合情合理、大聲疾呼祖先開墾的辛勞，或是遭受原住民威脅的可憐之處。相反的，在部落耆老口中，丟失的獵場與土地，因為客家村落多數土地早已私有化，而變得難以言說。也許是害怕遭受道德的譴責和汙名，讓「獵首」更是不太輕易被公開述說。這些問題都還算能克服，真正的難題在於雙方對歷史的相互壓抑和噤默，彼此之間那段血淚交織的過往，更多呈現出無法說、不可說、難以言說、無可訴說的情況。

我的第十五世的來臺祖，「梁心華」起先在新竹湖口、紅毛港一帶靠海的土地耕作，死於 1773 年，也葬在湖口。第十六世祖「梁愈道」，死於 1819 年，同葬在湖口。梁愈道的長子「梁國標」已經進入內陸的新埔、關西一帶開發，娶竹塹社的三姓族人為妻，死於 1855 年，葬在關西的下南片。第十九世祖「梁義連」在 1888 年左右，於新竹橫山一帶開發，接著是第二十世祖「梁阿泉」，

遭到「生番」所殺；「梁阿傳」則是在 1902 因違法出入「蕃界」，死於日本人的刀下；「梁阿田」又因為在日治時期擔任隘勇「征蕃」，重傷不治而死。



圖說：梁氏祖塔望向鳳山溪谷與龍潭銅鑼圈丘陵。

從早期在沿海地帶的耕作，一直到內陸地區娶竹塹社女子為妻（或是入贅），再到鄰近山區的開墾、死於泰雅人的番刀之下、違禁出入蕃界。這些過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對我而言，回到「鬼鄉」是為了再次聽見這些不輕易被言說的事物，再次和那些願意回覆我疑問的老者對話，以及看見歷史光亮下所無法看見的暗部。

### 內山——浪漫台三線？

「內山」一詞，涉及到目光的不可見之處，以及一種由外向內窺看的視線感。這種對「山」凝視，是一種漢人往山區侵墾歷史的隱喻。百年前的漢人早已將「生番」與「內山」的凶險聯繫在一起，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甚至指出當時的書寫會以「險」、「阻」、「重」等語彙來形容「內山」無法渡越、易守

難攻的危險性。層層的山嶺會形成視覺的阻隔，對地理空間的遮蔽也造成人群活動的不安。不可見的環境被漢人與歷代外族認為是無法掌握的凶險之處，也是讓早期來到臺灣的漢人恐懼山區的原因之一。因而「內山」在視覺意涵上，背後存在著原住民棲居於深處的「潛像」（latent image）。

隨著漢人從移墾到定居的過程，原本帶有寒村、荒村與廢村意象的血淚歷史，在當代轉化為淺山地區「傳統客家聚落」的歷史形象。近年來，桃園、新竹和苗栗一帶沿山鄉鎮，作為國家級「浪漫台三線」政策的施行區域，境內的客家文化館、客家文化節、大地藝術季、客家桐花季、客莊美食與觀光活動日益興盛。區域內的客家人從以前必須面對山區的凶險、與原住民的土地競奪，需要武裝隘防組織才能存續的客家山村，轉為今日被官方政策形塑為「浪漫客家庄」的觀光形象。



圖說：桃園龍潭，2020年油桐花季期間，遊客在小粗坑古道上的桐花排樣。



台三線道路兩側的城鎮或聚落，表面上雖然是以客家人為大宗，實際上是包含「福佬客」、「平埔客」（道卡斯和凱達格蘭人後裔）、泰雅、賽夏原住民族等眾多人群匯聚之處。在客家庄當中則有操著詔安腔、海陸腔和四縣腔等各式地域性腔調、方言客語的客家人群。然而，「浪漫台三線」政策作為一種文化治理的大方略，似乎再次哄抬了客家人「開山打林」的艱辛，在許多光觀地區，無意間強化了樣板化的客家文化符號，並進一步形成原漢人群的再次劃界。

我總想著，面對提倡客家庄文化再造、觀光經濟為主軸的「客家浪漫大道」（Hakka Romantic Avauue）休憩廊帶，我們是否可以從歷史與人群記憶的層面，展開對於原住民傳統活動領域的反思？事實上，今日浪漫台三線上的客家鄉鎮，在 150 至 200 多年前，仍是泰雅族原住民的獵場與生活領域。據文獻記載，在新竹地區，就包括關西鎮境內的馬武督社、橫山鄉境內的馬福社、橫跨尖石與橫山鄉的麥樹仁社、馬胎社、活動於橫山鄉大山背與五峰鄉境內的十八孩兒社等等。雖然今日在土地與人口量，因為殖民歷史的過程而有所縮減，但因為昔日傳統領域範圍大多很接近今日臺三線周遭的客家聚落，使得當代部落的泰雅耆老仍留有祖父輩與漢人互動的口述故事，甚至是人群之間彼此產生摩擦、衝突的記憶傳聞。

對族人而言，面對漢人的「內山開發史」敘事，更精確來說是「閩客人群的武裝侵墾史」。只要對過往歷史稍有理解，大多數人應該都不會否認，「浪漫台三線」上的客家鄉鎮和東側的原鄉部落，曾經在很長一段時期當中，有過領域侵佔的紛爭和衝突。藉由「浪漫台三線」這個官方所劃定的人文地理廊帶，迫使我重新思考一處人群的交會的歷史空間，將原漢雙方的關係放入到交界帶或接觸區（contact zone）的視野之中來對等的理解。



圖說：桃園龍潭，三角林的茶園與後方的大坪山景。

所以我特別在意「人群互動記憶的塑形史」，淺山地帶的漢人武裝村落，進入到日本殖民時期，村落周圍已不再被視為凶險之地。儘管在很多今日的客家傳統聚落附近，原住民對於該地的影響已經褪去，但是，早年依據地勢與人群互動關係而選擇建構的坐落位址、防禦空間與和靈信仰，至今仍然以某種形式被擴大、延伸及運作著；老者們的故事也還在晚輩之間持續地流傳。圍繞的地景和遺留的墳塚、食番肉的記憶，仍然在消化和流散。這種歷史像是負面情感的堆積，每個生命都承受著前一代人的經驗及反思而來的重量，並雜揉著自身的經驗，經由某種卑屈的辯證、費解的記憶形塑過程，將故事再傳給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

逐漸遠去的歷史衝突事件，看似越來越輕盈，卻也越來越沉重。耆老們會談到和彼此有關的「無頭祖先」和「侵墾記憶」，儘管他不是當事者、只能傳述寥寥幾句話，卻還是能感受到一種沉痛感。在某些背負「無頭父親」或「無

頭祖公」的耆老身上，需要窮盡大半生命的時間，在家族和自我之間、原諒與仇恨之間、我族與異族之間來回辯證、調節、修復與平衡，以此面對上一代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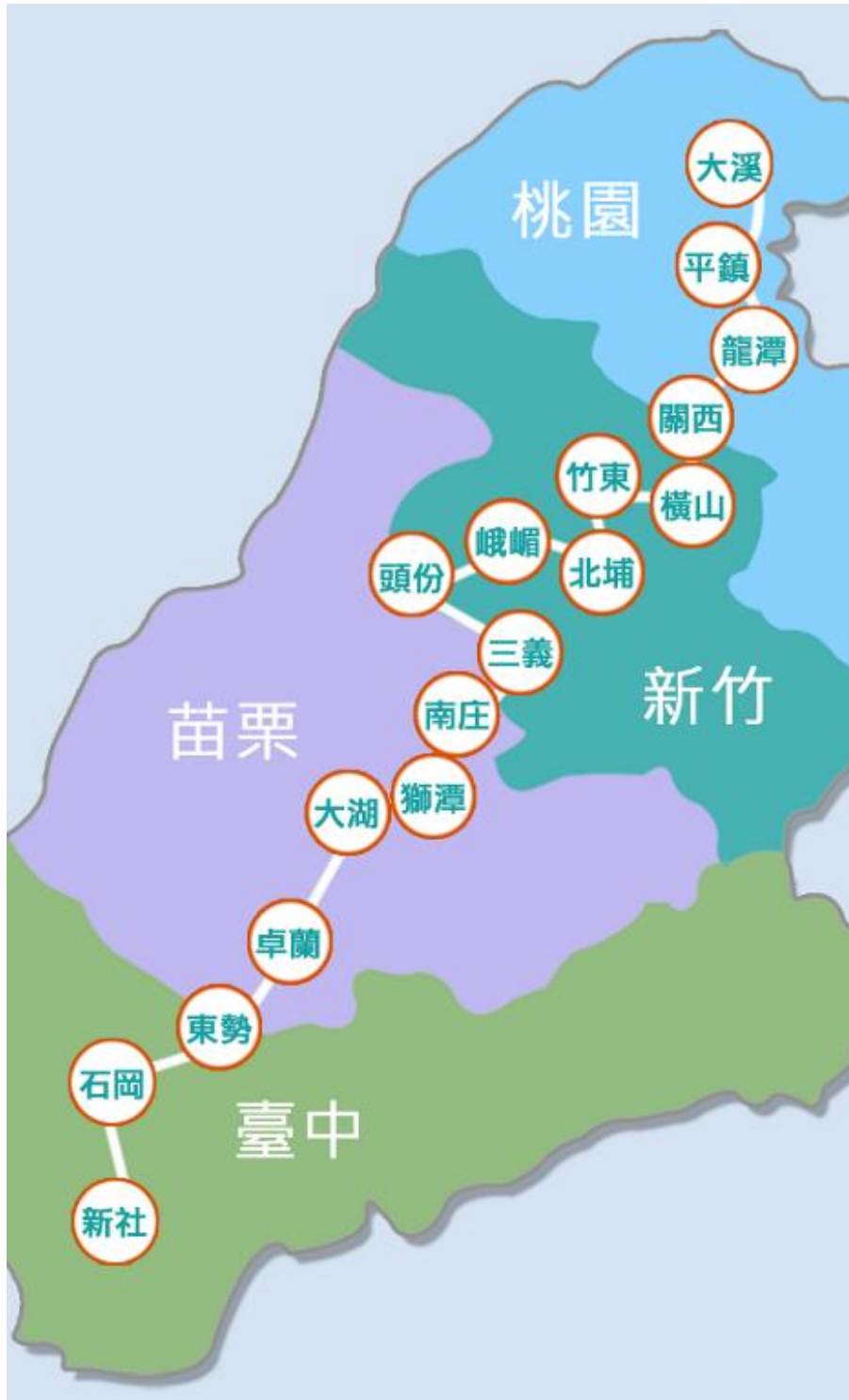


圖說：桃園龍潭，四方林開庄伯公前閒聊的伯伯。

這幾乎打破我以往從文本閱讀上沿襲而來的思惟方式，在這幾年間成為我所學習與珍視的部分，因為這些生命裡面蘊藏的觀點，是經由深沉思考與複雜現實相互辯證下的結晶。然而，遺忘確實是存在的，在淺山地帶的泰雅耆老這裡，也有相似的情形。關於「獵首」的家族故事和實際細節，多數部落晚輩所知甚少。無論是家族系譜、獵場的名字、語言或是人群遷徙的記憶，都越來越稀薄。實際上，這些故事卻被不少泰雅耆老收在心底，等待年青族人們來進行文史復振。

客家耆者對於族人「出草」、「刷人」、「剃人頭」（即「獵首」，但客語較常使用該詞）的認知多有誤解（這來自過去的仇恨和汙名），而泰雅耆老大多也沒親耳聽聞過「食番肉」的事情。彼此在 18 世紀以來有過的零星通婚、

交易、合作的記憶，也僅有少數人記得。儘管國家力量建構的準軍事界線（清代的隘寮設施、日治時期的隘勇線系統、戒嚴時期的哨所、管制站）已經撤除，人群之間在地方社會中也可以頻繁交流，甚至習得彼此的語言和文化。



圖說：「客家浪漫大道台三線」沿線的鄉鎮。

面對這段血跡斑斑的過往，人群雙方各自都在進行一種平行式的自我歉疚與集體囁語，各自流淌百餘年的思緒，很少有機會讓彼此知道。「噤聲」是雙方都沉默的結果，沒有出現你一言我一語的交集，讓過去的「土牛溝」、「番界」與「隘防線」所劃分的出的人群界線，化作一道心理、記憶與社會的界線，彷彿在今日仍然分隔著「山前的客庄」與「山後的部落」，彼此之間仍有一道難以測量的間距。

我在 2010 年代接觸到的閩客耆老，私下聊天時仍然說著「番仔」的用詞（但是已經知道不能在族人面前說），仍然記得誰家或何處曾有人被「番仔」所殺。有趣的是，鄰近部落多數 40 歲以上的族人也知道這件事情（表示人群之間仍有細微的話語流傳管道）。而且，這些多重衝突的經驗，很難被彼此所諒解（更多的是不說），更遑論被外人所理解。

在部落耆老這裡，也透過祖父輩講述的往事，大概知曉部落裡那一家的長輩曾到何處抵抗外族，在何地發生衝突，斬殺的是哪裡的客家人。但卻很少和孫子輩的提起這些祖先的故事，更遑論和客家人提起（除非有族人與某戶客家人建立起良好的信任或姻親關係，聊天時會提起，這是相對少數的例子）。相對的，部落耆老大多不知道客家人仍會透過祖輩的記憶，流傳這些往事，而且大多時候還講的比部落耆老的說法更詳細（可能是因為被殺害者的遺骨至今仍在祭祀，但部落的獵首習俗已經不再）。

如今，「浪漫台三線」上的客庄成為傳統聚落，成為人們世代繁衍的家園，客家人成為在地人之後，這個「客家族群的優佔區」背後更為深層的歷史課題，似乎是我們鮮少認真反思過從「移入」到「定居」的過程中，是否還挾

帶著「定居型殖民者」(settler)的共謀結構，雙方人群有還未解開的心結和誤解？

### 衝突——定居者與原住民

從今日台灣北部淺山地區原漢人群衝突的歷史結果來看，此處的閩客人群與族人，似乎是「定居者」(settler)與「被驅趕者、漢化者」之關係。「浪漫台三線」上客家庄形成的歷史過程裡，無法迴避的便是這種「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式的人群「佔居」、土地「佔墾」的歷史。這種殖民支配關係與多數殖民主義不同，指向的是一群渡海移民來到沿山地區，來了卻遠永不走、將土地劃為己有、定居於此的人群。



圖說：從鳳山溪谷望向馬武督部落前方的牛門口峽谷。

如此成功的定居者，意味著「永久殖民時間」的到來。漢人可以利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如政經壓迫、土地佔領、文化剝奪、種族歧視、漢化通婚及分化等手段，不只是排擠先住民，更是取代原住者，自稱為本地人、在地人。而殖民者變成人口的多數之後，他們就不可能全部離開，因此原住民永遠就無法獲得任何意義上的全面解殖（decolonization）。<sup>1</sup>



圖說：新竹關西，從梁氏祖塔望向鳳山溪谷地。

但更為複雜的是人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原住民作為生活於淺山地帶有力的行動者，實際上大大影響著不斷移入的閩客人群，包含在眾多漢人在侵墾時期的精神狀態、造成異族恐懼和死亡（獵首）的力量、歷史中的記憶形塑過程，甚至成為決定武裝型村落空間如何佈建的關鍵因素之一。今日，當初從外地移入的「定居者」後裔無處不在，若說定居型態的出現，意味著人與土地關係是從「墾」

---

<sup>1</sup> 《台灣理論關鍵詞》

到「殖」的支配過程。那麼歷史的遺緒，則以鬼魅、死者的形象不斷復現，持續斡旋於「定居／殖民者記憶」與「原住民的記憶」之間。

均質而平滑的空間（平原地區）不容易產生鬼魅，反倒是地形破碎、曲折、邊角、幽暗之處——原野與山地的交界地帶——數萬年前的斷頭河作用，在桃園、新竹一帶留下了古河階的地形。並於百年前意外成了人群交殺的現場，在客家先民所欲墾墾的土地上形成死亡的溫床。以往的歷史書寫對於「靈」的問題避而不談，或是棄之於鄉野奇談的範圍。但若「定居者」與「原住民」產生了衝突——屍首分離的屍骸在各自的世界中形成了極為忌諱的凶死者。那麼「靈」（鬼靈、地靈、惡靈與祖靈）的問題，對於衝突中的當事者、涉入者與家族親屬而言，就不只是一種想像之物。



圖說：新竹關西，「向天公」之墓祭祀昔日墾荒的喪命者。



這幾年的走訪過程，我不斷遭逢伯公神、防番之神靈顯靈趕走異族、無名大墓塚的遺骨、墾民和隘丁之墓、無頭祖公婆、無頭亡魂作祟等造成地方不安的傳聞。因為「獵首」、「殺人」、「食番肉」而衍生的種種凶死命案及死亡現場，在不同歷史時空中交錯、疊加成一處陰晦的地理界域。這促使我開始去調整調查的方法與認知：不完全再以帝國統治者、外來殖民者的檔案作為挖掘和分析的對象，轉而開始重視以精神信仰、超自然（神靈顯化傳說）與歷史現場（凶死命案地點、地方傳聞現場）的民間記憶和敘事觀，從這個角度貼近理解那一段土地侵墾的血淚史，如何與人群記憶、心理狀態和生死觀念接合的過程。

這片人蛇混雜的淺山，既是地形接壤帶，也是人群交界、文化和宇宙觀的接觸地帶。對於在帝國前沿使勁「拼命」的武裝侵墾人群而言，交界地帶是一處使人陷入瘋狂的環境——銜接著凶死、衝突與不安。對於今日的定居者來說，山景成為記憶纏繞之所，成為活人／死屍、鬼魅／神靈、虛構／現實、歷史／記憶之間彼此混雜難分的中介空間（liminal space）。

潛伏在現存客家庄人文景觀之下的陰晦空間，其實是一部「定居者」的暗黑史，卻在筆路藍縷、披荊斬棘、開闢山林、剝猛打拚、耕山耕田等修辭用語底中被淡化，轉寫成一部咬牙切苦、淚汗淋漓的家園闢建史。雖然，這種感覺確實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描述那段充斥血味的身體裂解史——屍首分離的創痛、遺憾與仇恨，被轉化成對抗「獵首者」的動力的故事裡。

但是，侵墾、逼迫、欺壓、殺戮的事情也一併在過程中發生，甚至兩者之間互為因果。彼此力量的撕扯之物——頭顱／番肉；無頭屍／番仔膏，某種程度讓身體的構造，分別決定了衝突與死亡的根本形式。死者的形象充盈著血

味，肉身被拆解成塊狀物，各自產生自己的鬼魅敘事。若從國家的角度，永遠無法看見這些流散、充滿生機的故事，也無法在官方地圖上的明確族群界線中，看到這種散裂而流動的記憶傳聞，因為這是藉由各種橫越界域內外的人群，所交織生成的液態敘事。

### 界線——跨界流動的諸民與眾魂

原漢人群互動的歷史上，沿海到山區都曾經存在各種界線。隨著界線不斷的邊變化和推移，直到 19 世紀末，北台灣淺山地帶的上空仍飄著一股濃重不散的血味，這裡一向不存在足以統攝各種人群的政治力量，更沒有一個代表性的國家和政府，能夠藉由正式的談判、協商來解決此地常久以來積累的仇恨——這是一處接近無政府、私刑繁盛、不存在現代戰爭制度的山河交殺之處。在絮亂交雜的人群空間中形成多重的社會秩序，彼此相互對質與折衝，不斷生成各種各樣的武裝爭鬥與流血衝突。



圖說：桃園龍潭，三角林聚落望向關西與尖石的山景。

當時的淺山地區，位處於帝國的邊界，既是官府勢力的盡頭、漢人覬覦的界外，也是山區泰雅人遷徙到來之後，延伸至淺山的獵場。因為靠近內陸且地形複雜，一直到日治初期仍是統治者力量無法深入之處。長期隨著地方族群彼此勢力的消長而不斷變動，在界域的推移之間，構成一段特殊的人群流動、器物交流的歷史。除了凸顯出足以造成帝國憂患、邊區治安問題的地理特性，也形成遊走在帝國律法邊緣、非法群結、私通境外勢力、窩藏逃犯、醞釀反叛時機的政治條件。

然而，在人群開始發生接觸的時候，每群人都跟山林、土地、溪河、樹石樹都有很深層的連結，淺山地區仍是低度開發的景貌，環境的條件幾乎高度影響生存的方式。從人群移動的角度來說，凱達格蘭、道卡斯、泰雅族至少在 1750 年左右都已經視此地為鹿場或獵場；客家人、閩南人在 1800 年之後開始進到這個區域，一直到清末時期，日本殖民初期的前 5 年，也就是可能發生在 1800 到 1900 的這大約百餘年時間人群交會的歷史。



圖說：桃園大溪河階地上的市鎮與後方的山嶺。

泰雅人、客家人、閩南人、凱達格蘭人、道卡斯人彼此在地界之間的關係，都不只是清朝政府畫的界線，有的是已經超出界線的界線，有的是根本不存在古地圖上的線，而是人群之間的衝突關係而形成的拉鋸空間。它除了是一個會不斷移動的線，這些界線本身就是一處混雜性的區帶。這個仿若平行的世界裡，存在各種彼此猜忌、錯誤認識、無法溝通的平行宇宙觀，卻又因為充滿各種地形的黑洞，讓彼此無時不刻都可能被擠壓在一塊。

不只是原漢人群之間的界線，泰雅部落與閩客聚落之間，還有和平埔族勢力範圍之間相互重疊。這種多線交織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不是反映一種二元的族群接觸和互動，而是將過去被人文、政治界線所分隔與簡化的主體——各個相互衝突又交纏的人群關係（外來者／原住者；侵墾者／維權者；殖民／被殖民者）重新複雜化。多方人馬並非以「分離」（separateness）或「隔離」（apartheid）的方式出現，而是同一地理時空中的共在（copresence）。如果人群界線的推移、武裝侵墾及國家政策的介入，均為影響一地聚落、部落形成或消失的重要因素，這種說法強調了歷史運作過程中的時空要素。

清帝國的移民政策與人群劃界手段，並沒有殖「民」山區的泰雅人，族人面對漢人的進入，反而是退入到更深的山林，伺機反抗（除了少數歸化者），因此僅存在對於土地的「殖墾」。現今「浪漫台三線」所包含傳統上北台灣的淺山地區，原本從平埔族與泰雅族的獵場，到清帝國劃設的「隘墾區」和武裝村落的構築，經過了數代人對土地的墾殖。進入到日治時期，隨著隘勇線的推進，才真正是對族人與山地的殖民。

從接觸地帶的人群分布、地理界線的形成中，我感受到在「人」的力量之外，「靈力」也在界線的內／外交互作用。這些死者，這類無頭屍身，時常變作一種難以被化解、無法輕易和解、不可被超渡的亡靈——無頭鬼。鬼魂是否存在並不重要，也不是歷史事實與否的問題，而是透過人們的經驗、傳述與信仰所呈現的無頭鬼形象，在漢人與族人之間都以「見鬼」的傳聞被流散，溢出了既有的文化觀和宇宙觀，讓這種鬼魂具有在不同宇宙觀之間遷徙的力量。



圖說：桃園龍潭，三角林聚落一帶遭不明人士斬首的無頭伯公神像。

面對主流漢人社會遺留的「定居者記憶」與「定居型殖民的歷史」，讓我覺得有必要重新回溯這個區域的人群關係，可能最為複雜的時期，思考各種群體如何參與到這個歷史的過程裡面，從斷頭河、襲奪灣、脊谷、石頭、山林、紅土層——

交互在「歷史地理學」與「地理歷史」視角下的物群、人群關係，包含了泛靈物、自然物的部分——也許可以讓我們今天在重新反思人與人、人與物、物與歷史、歷史與記憶、記憶與當今現實的關係。

對我而言，這些和人群之間都有多重關聯性的歷史，卻難以和對方述說的記憶，具有觸發彼此重新理解過去、解開誤會的契機。因此，如何化解彼此的關係？是否不再以當代的「族群對立」或是「政治鬥爭」的方式，而是在具有細膩度的感受中找到足以協商的空間，才能進而去面對這段血淚歷史所產生的誤會？也許從每個部落與客庄開始認識，是一個根本可行的方式。

### 部落與客庄——村里化的歷史

在 1700 到 1750 年間，活動於龍潭、關西淺山丘陵地區的原住民，是泰雅族大崙崁群與馬裡光群的馬武督社原住民。泰雅人早在客家族群進入此區域之前，已經從山地延伸到淺山地區活動，導致雙方時常發生衝突。接著，從清乾隆到清光緒的百年之間，原漢關係持續緊張，維持著一定密度的互動關係。雖然總體來說，客家移民不斷的將墾地向山區推進，但是「墾戶棄墾」、「佃人被殺」、「隘防廢弛」、「墾地復為番地」之事反覆發生，墾區與隘防線的範圍也經常變動。

晚清「開山撫番」的政策下，國家力量進入此地的山區，讓泰雅族與漢人的關係更為複雜與微妙。當時的泰雅人可以持續（在有部落內部或外部因素的情況下）對某個漢人村莊進行「獵首」，又可以和另一處漢人村莊發展友誼互利的商品交換關係，甚至同時間有條件地讓漢人進入到部落的領域上伐樟製腦。十九世紀末的馬武督部落與周邊數個漢人村莊的關係即是呈現此種狀態。

具體來說，當時每個泰雅部落與附近漢人村莊之間的關係都不一樣。這也是當時許多從外地前來、搞不清楚複雜情況、又剛入山工作的漢人所懼怕、困惑的部分，因為多數漢人並不完全理解泰雅人的土地觀念和宇宙觀。同樣的，漢人村莊也會有一些勢力較強、人丁興旺的家族，長期和部落在土地方面有所糾紛，也會有熟稔泰雅語、擅長和特定部落族人打好信任關係、建立對話管道的家族，往往可以避免被獵首的險境，使時不同村莊和家族在面對「番害」，會有不同輕重程度的傷亡。取決於個別村莊和部落，以及特定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關係，無法以整體「族群」的單位來看待這之中的人群交往、對立與衝突等多元互動的現象。



圖說：戰死山野日本軍警與頭骨（示意照片）。

1895 到 1900 年之間，因為清帝國的官制隘防再次撤守，一些地方必須回到私人武裝防禦的狀態才能存續，一些地方則復為「生蕃地」。1905 年之後，北台灣各地的閩客山村，因為由現代國家機制、殖民軍警的隘勇線推進政策，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的生活空間，被國家軍事力量劃分的界線隔絕開來。間接地讓淺山地區原本需要透過隘防才能存續的客家山村得以安穩發展，也讓原漢人群之間

的緊張的衝突關係逐漸趨緩。直到今日，除了銅鑼圈有部分蕭家族裔、關西境內有部分衛家等平埔族墾民後裔之外，本區域各村落的人口以客家族群為多數。



圖說：新竹新埔，竹塹社後裔的三姓祖塔。

今日，在泰雅人退移之後、在多數平埔族人們隱身之後，歷史已經被客家、閩南等定居者為主流的「開發史」敘事，進行敘事框架的置換和移轉，掩蓋了族人為主體感受的「抵制侵墾史」。悲哀的是，在幾近條列式的官方紀錄，僅能從文字紀錄、官僚檔案、社會結構、土地制度層面審視土地的過去。隱藏在民間歷史中，諸多人群互動的細節，以及原住民這端的口傳敘事，仍然有待後續的挖掘和理解。

面對歷史現場，需要透過具有地理感的踏查，去串連起點跟點的關係。這需要一種村落化的調查意識，以「莊」與「社」為單位的互動關係視角，細緻的進行一種村里化空間與家族生命記憶的考察。比如，透過以地方傳統聚落（時常是以村里之間的人際網絡範圍為單位）的口述記錄與家族史經驗，來重新述說「食番肉」



歷史，也許可以面對歷史書寫在情感上的困境（往往地方上的知情人士會掩蓋或含糊帶過）。

每群人在今日都有失落、遺落與不完整的歷史，正視在各自身上所不願多談的部分；正視雙方或多方人群勢力在接觸、疊覆和擠壓之後，所隱沒在歷史陰影下的那個部分。如同兩個板塊在相互交疊、擠壓之後的「隱沒帶」，正是人群接觸地帶所遺落的一塊歷史暗部。因此，如何重拾遺落在民間的歷史殘骸，回溯那些怎麼也說不清楚的記憶、無以名狀的卑屈經驗，透過個別傳統聚落與部落為基本單位的書寫，看見人們看待歷史的視差，體會到人群記憶流動的關係，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事情。

### 記憶——歷史的視差

雖然這幾年間，因為在部落與客庄之間來回地奔波，內心一直有著對於「通事」（昔日原漢族群之間事務的中介者）的不安。但是，奠基於對彼此認識而產生的寫作，讓我暫時壓抑「不會寫字」的焦慮，在有限的閱讀和無盡的實地訪問、行走之中，逐漸感受到一些理解歷史的疑難和空缺。也許這是很粗糙的印象，但在涉及到原住民族領域的「漢人開發史」研究中，漢籍研究者多以文獻、檔案的翻檢與爬梳，來重建和理解歷史過程與當今社會的關係。

清代的邊疆治理、隘墾社會、邊區社會等研究，以及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蕃地治理、蕃地行政區劃的研究文獻不少。但是，清帝國統治的 212 年間，北台灣淺山地區原住民各部落的情況和歷史，目前並沒有很清楚的史料和圖資，以至於鮮少相關的探討。某種程度上，這也讓我們難以細緻地探究那些位處

山地前沿、臨近平原丘陵一帶的泰雅部落，在過去 200 多年間的歷史和社會變化。



圖說：《淡新檔案》中龍潭南側、關西一帶的墾區圖。

特別是對於清代「隘墾區」中各個拓墾家族與墾區莊的發展，以及 19 世紀末「開山撫番」番政策下地域社會轉變的書寫，仍從漢人為主體的「移墾社會、隘墾社會」、「邊區社會」與「內山開發史」的角度進行討論。大多數涉及北台灣「內山」地區客家移墾史的書寫，鮮少進入到部落去理解族人的生命處境、口述歷史與記憶。另一方面，從事原住民歷史研究的學者，似乎也鮮少理解漢人或客家人對於歷史的記憶形塑與當代現象，僅積極地進行部落家族史、生活史與文化儀式、傳說、族語採錄的保存與和書寫工作。

這些都是令我敬佩的工作，也讓我受到不少啟發，但總覺得雙方研究的距離和交集變得很遙遠，這種族群之間的心理距離、研究領域之間的距離，甚至讓我感覺比淺山地帶客家庄和泰雅部落的實際距離還要遙遠。我總想著這段距離要如何重新銜接與對話，不僅是書寫領域和不同族裔之間的心理距離，也是不同人群在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中的距離。

部落跟客庄之間因為形成的歷史、地理的條件，以及人群移動與遷徙的方向性，文化的差異，土地觀念的不同，在回溯歷史的時候，對彼此的過去都還有很主觀的表述，進而出現一種歷史視域的視差。也因為如此，我這幾年下來，時常聽聞耆老說故事的感覺往往會是——雖然此地的人群不曾擁有過任何先進而精良的武器，但憑藉著肉身、槍彈與刀械，也足以捏塑出一段令人動容、卻也時常駭人聽聞的歷史。

在土地開發史方面，從客家耆老的角度，往往被傳述成艱辛墾荒、胼手胝足、開山闢林的「苦行」，而掩藏了存在「侵墾」行為的事實。對當代的閩客耆老而言，「誰開墾就是誰的土地」為內建於早期漢人移民社會的土地使用觀念，因此在受訪耆老的觀念裡，開墾土地並非強佔某人的土地，因為只有透過開墾，土地才會是開墾者所有。

必須被開闢的土地被認為是無人的荒野，土地是需要經過開墾，才能為人所使用的地方，而漢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繫是透過開墾的方式固定下來。這種土地使用的認知方式，與泰雅人對於土地倫理及生活領域的認知完全迥異。更嚴重的是，因為土地是清帝國所分配的、合乎制度的、申請墾照而來的，也是開墾者所開墾的，所以沒有被分配、位於制度外、無開墾的泰雅族人並不能擁有土地。



圖說：桃園楊梅，隘口寮聚落一景。

依照此種觀念，開墾者將所到之處，完全視為需要進行拓墾的荒埔，並進一步因為需要居住，反客為主的將原住民視為「外於這片土地」的外患，不能使其進入「已開墾」的土地，故需要設置隘防阻止原住民的這種「外患」進入。<sup>2</sup> 從泰雅人的角度，這些土地開墾與分配的過程，實際上都是殖民當局與隸屬於其下的墾民（漢人與平埔族），單方面進行的一系列未經協調、任意開墾、分配土地的暴力侵佔過程。<sup>3</sup>

也因為根源於土地觀念的差異，而泰雅人過來到「漢人所開墾的土地」獵首，族人就反過來在漢人的觀念中成為侵犯者、危害到漢人生命安全之族；而漢人的土

---

<sup>2</sup> 梁廷毓，〈桃園龍潭進山地區耆老口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4（2017.12），頁 135-136。

<sup>3</sup>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4 期，（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128。

地觀念又將自身是侵占土地者的角色忽略或淡化，將自己反過來成為被侵擾者、受害者。因此，當代閩客耆老對於「番害」的記憶中，並沒有明顯的「漢人侵逼說」，反而因為親人的傷亡而主觀上認定自己是受害者<sup>4</sup>；泰雅人則被想像與重新建構成為加害者。

比如，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那一代泰雅人，生命中經歷了遵循祖遺律而進行 Mgaga、到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獵首，獵場生態從物種豐富到童山濯濯、砍伐殆盡、以物易物到貨幣交易、共享觀念到財產私有制度等。使獵首成為當時沿山地區的部落，面對漢人逐漸增加的人口數量與整體環境壓力、面對生活習慣與社會價值可能有所轉變的威脅，所形成不得不為的最終選擇。

這導致部分泰雅耆老在描述「獵首」漢人的記憶中，已經鮮少有原來宇宙觀與傳統儀式觀念的支撐，反而被自己簡化為殺人惡行、從而遭致詛咒的後果。這之中也沒有族人被欺壓的「弱勢說」，反而有些耆老將祖先放在「殺人」的加害者位置，漢人則是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受害者。<sup>5</sup>另一方面，有些耆老則認為歷史中既存在著「漢人侵逼」，但也覺得過往祖先殺人違反了祖律，以至於後代產生厄運，形成兩個矛盾的力量持續並存的複雜現象。

閩客耆老則將「獵首」儀式簡化為「剝人頭」，因為凶死觸及到漢人對於死亡的禁忌，更加無法諒解讓祖先人頭落地的兇手，進而將獵首儀式描述為「殺人」，不時以會以「食番肉」的方式洩恨。族人也無法完全理解，當時漢人社會內部出現的人口壓力和生存需求，也無法接受漢人對山林、土地殖墾、侵佔獵場的行為，

---

<sup>4</sup> 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第 70 期 2 卷，(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20)，頁 181。

<sup>5</sup> 梁廷毓，〈新竹沿山地區泰雅部落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第六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桃園：私立新生醫專，2020)，頁 115。

在文化認知和社會觀念都有所差異的情況下，成為需要透過 Mgaga（以獵首作為最高的仲裁儀式）來解決問題漢人惡行的最後手段。



圖說：Tusuy Bayan 耆老家族傳下的獵刀。

在一些道卡斯與凱達格蘭家族後裔耆老中，並沒有從漢人的角度敘述「開發史」，而是強調家族在開發歷史中的重要位置，尤其在而對於客家人的描述上，則強調自己作為帶領者與保護客家人的角色，帶領客家人但內山地區開墾、保護漢佃免於遭受泰雅族的攻擊。這種「高位視角」強化了自己與漢人之間在開墾工作上的位階關係。而在敘述與泰雅族互動與衝突的記憶時，隱含著一種文明進步論的思維，會將「平埔族」與「高山族」進行當代的解釋與位階的區分，暗示我族（平埔族群）是比泰雅人還文明的族類，進而區辨出「較文明／非文明」的認知。

其中有一些歷史認知上的差異，來自於世代之間的以訛傳訛或加油添醋，進而對彼此產生印象式的誤解；而對於異族的想像，在缺乏理解和時間積累的過程中不斷被加重。從過去人群到當代族群之間的劃界過程，又明顯地受到晚近族群分類體系、殖民知識與清帝國族群政策的重重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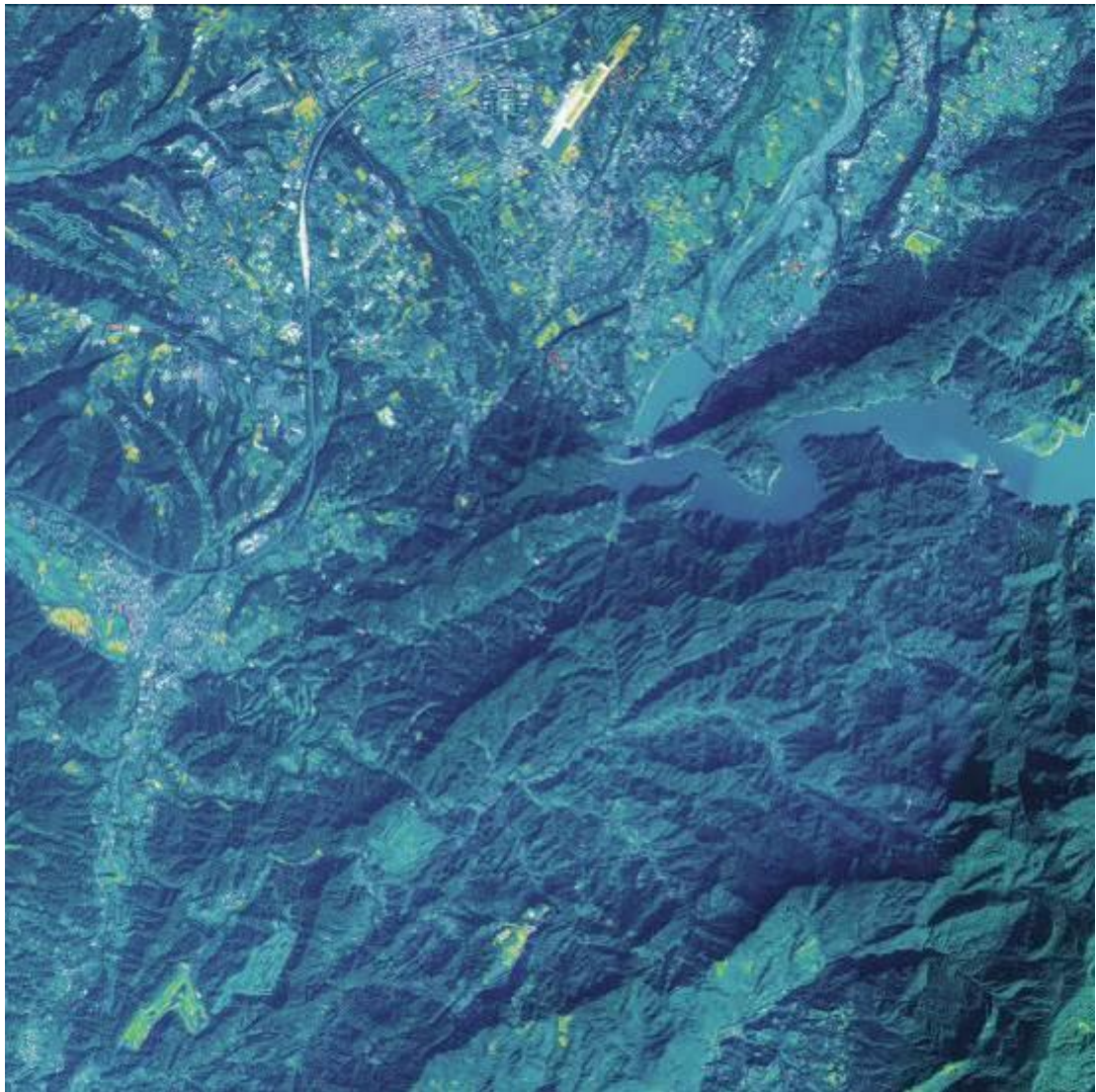
圖說：桃園龍潭，霄裡社後裔的蕭家先祖牌位。

如果人是活在一個由歷史與想像所建構的現實裡面，那麼對人群記憶樣態的考察，則可能用來朝向一種現實關係的重新型塑。因為經由記憶所捏塑出的歷史認知，會直接影響到今人認定其他人群的方式。除了各自歷史視域的錯差，也存在人們在過去／今日認知上的時空錯置，形成對歷史事件的各自表述，甚至造成難以化解的情緒和誤會。

我想，這本書所探詢的是接觸帶與交界帶上原漢人群的身影，這條界線在北台灣的歷史上，似乎逐漸由濱海沿線推至淺山地帶，因而從平原、丘陵至淺山，處處都有因為雙方接觸、衝突而留下的地名、記憶和物質痕跡，形成一條充滿血與汗的界線。這條界線在百年前逐漸停緩在今日「浪漫台三線」一帶，雖然呈現相對

較小幅度的擺動，但激烈衝突所導致的血汗味更為濃重。

如果你一開始是循著血味、跟隨著找死和尋鬼的心理而來的讀者，或被「獵首」和「食人肉」的悲痛歷史所吸引，那倒也無妨。希望當你開始閱讀這本書時，會開始進入到地方紋理和歷史脈絡之中，有些事情會比你想像的更錯縱交雜，甚至一改原本對歷史、對族群關係的理解。這是我的目的之一，亦是對書寫作為一種藝術與社會實踐的期許之一，其餘留待後面述說。



圖說：本書內容涵蓋的桃園大溪、龍潭、新竹關西地區之衛星空照圖。